

罗振玉致法国汉学家沙畹未刊书札十四通考释*

贺梦莹 周霄汉

内容摘要: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有罗振玉致法国汉学家沙畹的十四通未刊书札,系罗振玉1912至1915年间避难日本时期所作,主要目的是了解沙畹考释木简的进度,并请求提前阅览木简影印件。书札内容涉及罗、沙二人在简牍文字、甲骨文、金石文字以及敦煌文献方面的交流与研究历程。罗振玉与沙畹的交往历史,由于材料缺乏,一直未被学界深入了解。此批书札为补充罗、沙二人的交往详情以及探究同时期中法学者的互动历史提供史料参考,具有文献价值。

关键词:罗振玉 沙畹 书札 学术交往

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是法国现代汉学的奠基人,他扩展了汉学研究领域,在其中纳入碑铭、考古、简牍等内容,同时创新了研究方法,运用西方现代实证主义史学和考古学方法进行研究。他也是最早来华进行实地考察的西方汉学家之一。罗振玉(1866-1940)是近代著名金石学家、收藏家及古文字学家。晚清光绪年间,国势倾危,内忧外患之际,罗振玉先于同辈之人,敏锐地发现中国历史遗产的价值并进行抢救和保护,包括安阳甲骨、敦煌写本、石刻墓志以及清宫内阁大库所藏历史档案。同时,罗氏也是甲骨文、简牍文字、敦煌文书等史料的重要整理者和研究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发现的中国古代文献成为国际汉学界和中国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焦点。罗振玉和沙畹分别是中西方最早接触与研究这些史料的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们相识相知、相互钦佩并相互协助,结下了珍贵的友谊。学界目前较为熟知的事件是,罗振玉与王国维(1877-1927)考释“流沙坠简”的过程中获得沙畹极大的帮助。后者将自己刚刚考释完成但还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法国汉学巴黎学派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与发展研究”(20CZS047)阶段性成果。

未出版的有关斯坦因(Aurel Stein, 1862-1943)从新疆、甘肃挖掘的汉晋木简的法文手写论著和简牍照片一起邮寄给罗振玉,使得罗、王二人得以迅速开展相关研究,并在几个月后出版了中文世界简牍学的重要著作《流沙坠简》^①。中国简牍学的研究也发轫于此。

学界虽多知晓这一中外学者交流合作的佳话,但对他们之间更为详细的交往历史,目前除罗振玉的论著中有零星自叙外,仅有《史与物:中国学者与法国汉学家论学书札辑注》一书披露了部分保存在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Musée Guimet,下文简称吉美博物馆)“伯希和档案”(Fonds Pelliot)中的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致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书信,其中一些内容涉及到罗振玉与沙畹的交往^②。而吉美博物馆“沙畹档案”(Fonds Chavannes)中所藏罗振玉直接写给沙畹的书札,还未被学界知晓并研究。

“沙畹档案”第59号及87号档案^③中收藏有十四通罗振玉致沙畹的手札,写作时间为1912至1915年罗振玉避难日本时期。罗振玉写信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沙畹考释汉晋木简的进度,并请求提前阅览木简影印件。本文以这批尚未公开的信件为对象,以罗振玉、沙畹为中心,探究中法学者在简牍文字、甲骨文、金石文字以及敦煌文献方面的交流和研究历程,为学界了解罗、沙二人,以及同时期中法学者的互动和交往提供史料参考与补充。文章将誊录并标点书信原文,考释信札时间^④、人物及事件,在此基础上钩沉史料,以期完整还原罗振玉与沙畹之间的学术交往史。

沙畹博士讲席敬启者:

去岁拜读手教,并承赐大著,拜谢无似。其时敝国革命军起,朝野骚然,弟东渡扶桑,未能即复,至以为歉。比维道履健胜,著述日增,定如远想。弟避地以来,仍研究殷墟文字,今年拟编成前编,并将说解写

①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卷一,东山学社,1914年,第1-2页“序一”。

②祖艳馥、达西娅·维埃荷-罗斯编著:《史与物:中国学者与法国汉学家论学书札辑注》,商务印书馆,2015年。蔡渊迪:《法国吉美博物馆藏罗振玉、董康至伯希和书信四通考证》,《嘉兴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第73-79页。

③“沙畹档案”按照档案盒进行编号,盒中的具体文件则没有编号。

④多数信件落款处标有写信日期。上引蔡渊迪的研究已指出,罗振玉因政治认同的缘故,一般仅以干支记年,信中所署月、日皆为阴历。为方便说明,本文行文中统一使用公历(并保留书信原有的阴历日期)。此外,有部分信件未标注时间,则通过信件内容考订并推测日期。

成,明年当可付印,印成以后,当奉呈大教也。先生考订木简何时成书?有近著尚求赐示,翘盼无似。兹因敝友狩野博士之便,携奉《藕香零拾》一部,敬祈暂存。狩野博士深于经术,为三岛硕学之魁,并为介绍,想亦先生所至愿也。秋气渐寒,维起居珍重,不尽拳曲。并祈时赐数行,不遗在远,幸甚幸甚。

弟罗振玉再拜。壬子八月十八日

此信写于1912年9月28日(壬子年八月十八日),是档案所藏罗振玉写给沙畹的最早一封信,并附有信封,上附言:“内函外书,敬祈狩野先生面致沙畹博士讲席,罗振玉介绍。”该信和《藕香零拾》一并由罗振玉的日本友人狩野直喜^①于1912年秋游历欧洲之际转交沙畹。

据罗振玉自述,他于“宣统初,因法国伯希和教授,得与沙畹博士书问相往还”^②,但未明确年份。学界以往认为,罗振玉与沙畹是自1912年起开始通信^③。而此信提到“去岁拜读手教,并承赐大著”,说明至少自1911年起,罗振玉与沙畹已开始通信。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罗振玉自11月起流亡日本,旅居京都,在战乱前后已与沙畹取得联系开始通信。

此信中罗振玉说“仍研究殷墟文字,今年拟编成前编”,是指《殷墟书契前编》。事实上,1911年正月,罗振玉已完成《殷墟书契前编》二十卷^④,并且前三卷的拓片影印件已分别刊入同年罗振玉与王国维创办的《国学丛刊》的前三期。写此信时,《前编》还未全部印成,第三封信会再次提及。值得一提的是,沙畹1911年发表《中国上古时期的龟甲占卜——以罗振玉先生论著为基础》一文^⑤,主要是参考罗振玉1910年出版的第一部考究甲骨文的论著《殷商贞卜文字考》而完成,在梳理中国甲骨学发轫与发展的同时,肯定了罗振玉的贡献。由此可推测,罗振玉在之前的通信中很可能曾将《殷商贞卜文

①狩野直喜(1868-1947),日本汉学家、历史学家,“京都支那学”的开创者。1912年9月赴欧洲留学,追踪访察被英、法、俄等国的探险家所攫取的木简、敦煌写本等考古文物,同时参观各个汉学研究机构并拜访一些欧洲重要的汉学家,1913年10月回到日本(王冀青:《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28-130页)。

②罗振玉:《集蓼编》,罗振玉著,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一集《集蓼编(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3页。

③王旭梁:《罗福荃生平及其学术述论》,文史哲出版社,2015年,第35页。

④罗继祖辑述:《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二集《雪堂剩墨》,第384页。

⑤Edouard Chavannes, “La divination par l'écaillé de tortue dans la haute antiquité chinoise, d'après un livre de M. Lo Tchen-yu,” *Journal Asiatique*, X^e sér. (1911), pp. 127-137.

字考》赠送沙畹,对应信中“仍研究殷墟文字”一句。由此可见,自1911年起,沙畹已开始关注以罗振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的研究著述,在向西方介绍这些研究成果的同时自己也开展进一步研究。1913年,罗福苕将《殷商贞卜文字考》译成法文并寄给伯希和,以期在法文期刊发表^①。

伴随此信,罗振玉将缪荃孙(1844-1919)编刻的《藕香零拾》一书赠送给沙畹。该书1910年刻成,收录流传罕见之书(藏书、史志、方志、年谱、笔记等杂著)39种,共101卷,并配有跋文或校勘记^②。信中罗振玉还专门向沙畹引荐了狩野直喜。狩野在赴欧洲前并不认识法国汉学家,在罗振玉的介绍下,狩野在法期间得与沙畹、伯希和、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1945)等汉学家有进一步的交往,促进了东西方汉学界的交流互动^③。

此信中罗振玉唯一咨询沙畹的事情便是“先生考订木简何时成书”,该问题在之后的书信中又屡次被提及,表明罗振玉对沙畹研究汉晋木简或对这些简牍文献本身的关注。

二

沙畹博士有道:

昨奉复书,敬悉道履安胜,至慰至慰。闻先生考订司坦因博士所得木简,先睹为快。但不知能先将影本赐寄否。敝友王君静安(名国维)所著《简牍检署考》稿本寄奉,或有裨于尊著也。《国学丛刊》第三册已寄交伯希和君,托其转呈,到时祈督收。尊著《亚细亚旅行记》已刊行否,千祈早日寄读,至幸。《史记》现译成几许?已印行者几册?拟购求一部,不知价值若干,祈示寄。小儿福苕现习贵国文,拟令读之也。弟于先生心契已久,重洋阻隔,不得一瞻道范。尚求赐照片一纸,以当晤面,千祈弗却。专此敬申,虔请著安。冬寒维珍重。

弟罗振玉再拜。阴历十一月二十五日

拙书草率,故令儿子别译贵国文者,附呈,又启。

赐函以后乞寄“日本京都上京区净土寺町字马场八番九番”,因弟二十日以后即移居也,附陈。

此札附有信封,含邮戳,且配有法文翻译。日期为1913年1月2日(阴历十一月二十五日),邮戳显示是同日从日本京都寄出,法文翻译标注日期

①Lettres de Luo Zhenyu à Pelliot, le 5 avril, le 25 mai, le 23 juin 1913, Fonds Pelliot, Pel C64d, Correspondance Pelliot, 1913, Musée Guimet.

②罗志欢:《中国丛书综录选注》上册,齐鲁书社,2017年,第143页。

③李庆:《日本汉学史(修订本)》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20-430页。

是1913年1月3日,疑似有误。

此信中,罗振玉担心自己“拙书草率,故令儿子别译贵国文者”,表明这应该是罗振玉写给沙畹的最初几封信之一,由于还不太了解沙畹的汉文水平及辨识能力,所以附上法文译文,此信之后的两封信也都配有法文翻译。为罗振玉翻译书信的是其第三子罗福苕(1895-1921),据学者王旭梁研究,罗振玉自1909年在北京遇到伯希和并了解到一大批敦煌文书被送去法国后,便鼓励儿子福苕学习法文,即信中所言“小儿福苕现习贵国文”。罗振玉明白,法国人在掌握了敦煌文献后,便会在未来有关中国古史的研究中扮演关键角色,如果想与之建立学术交流,就需要掌握法文。因此,福苕14岁起便开始学习这门语言^①。而翻译罗振玉书信时,罗福苕已学习法文三年,从译文可以看出,他已具备了很好的法文写作和表达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在法文翻译中当涉及中文人名时,罗福苕已能按照法国远东学院(*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的拼音系统^②进行拼写,如,将“罗振玉”拼写为Lo Tchen-yu 或 Loue Tchen Yu,将“福苕”拼写为 Fou-Tchang,将“王静安”拼写为 Wang-King-ngan。此信中罗振玉咨询沙畹《史记》的翻译和出版进度,“拟购买一部”“拟令(按:福苕)读之也”,也进一步证明了罗福苕的法文能力。罗福苕自小便展现出语言天赋,除法文外,还掌握日文、英文、德文及梵文,还对西夏语有深入的研究。他在罗振玉、王国维与沙畹、伯希和的交往中扮演着翻译的重要角色。沙畹翻译的《司马迁〈史记〉》在其生前共出版了五卷,最后一卷完成于1905年^③。罗振玉写此信咨询沙畹时,沙氏已完成了全部出版计划,包括《史记》前47卷的翻译和注释。

从信的内容来看,罗振玉再次提到沙畹考释汉晋木简的事宜,并咨询“不知能先将影本赐寄否”。也许是为了向沙畹介绍中国学者的相关工作,也许是认为可以有助于沙畹研究简牍,罗振玉在信中首次向沙畹介绍了王国维,并赠送其著述《简牍检署考》。该事件王国维《简牍检署考》第四稿中的一段“后记”也有记载:“岁暮闻法国沙畹教授方研究斯坦因所得古简牍,复写一本遗之。”^④《简牍检署考》写定于1912年10月,是王国维对中国古代

①王旭梁:《罗福苕生平及其学术述论》,第29页。

②此系统由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 1835-1919)于1902年创立,在整个20世纪一直是法语世界最常用的中文拼写系统,与英语世界的威妥玛拼音系统(Wade-Giles romanization)齐名。随着汉语拼音在世界的普及,该拼音系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③Edouard Chavannes (trad. et annot.),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5 tomes, Paris, Ernest Leroux, 1895-1905.

④王国维著,胡平生、马月华校注:《简牍检署考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页。

简牍制度做的系统梳理。当时罗、王二人已经开始注意到西方探险家在中亚及新疆等地进行的探险活动以及挖掘到的出土文书,尤其是斯坦因发现的汉简和敦煌文书。二人旅居日本期间与日本汉学家交往密切,因此他们最先见到并研究的简牍也是日本学者橘瑞超(1890-1968)从中国带回日本的。《简牍检署考》中使用到斯坦因已出版的和橘瑞超提供的在中亚挖掘到的几份最新简牍材料^①。该书为罗、王二人之后撰写《流沙坠简》做好了铺垫。

此外,信中提到的《国学丛刊》是罗振玉与王国维1911年2月创办的学术双月刊,以研究发扬国学为宗旨,栏目分为经、史、小学、地理、金石、文学、目录、杂识八类,侧重对中国古代书籍的辑佚、校勘、考证、注疏。同年出版至第三期,随即暂时停刊^②。1911年,沙畹在其主编的汉学期刊《通报》(*T'oung Pao*)上为《国学丛刊》撰写书评,将该杂志前两期的文章都进行了介绍,表明在该刊前两期出版后不久,沙畹就阅读了其中的内容并立即着手撰写了书评^③,推测《国学丛刊》的前两期应该也是罗振玉寄送的。书评内容包括对伯希和敦煌藏经洞发现的部分文书的评注、甲骨文、唐代军队的划分、石刻文字目录等,是当时中西方学界都在关注和研究的主题。针对《国学丛刊》的内容,以沙畹为代表的法国汉学家们也进行了一系列回应。例如,在有关摩尼教的研究上,沙畹与伯希和于1911和1913年发表翻译和考释文章《在中国发现的摩尼教文书》(又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④,即是以罗振玉1911年发表在《国学丛刊》第二期上的《波斯教残经》^⑤文章为基础进行的研究。这一残经当年未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带离敦煌藏经洞,罗振玉将其命名为“波斯教残经”并进行研究。他的文章立刻吸引了伯希和的注意,后者随即放下手头对敦煌文书的整理工作,并邀请导师沙畹一起考释。他们将残经翻译为法文,考释认定为摩尼教经书。由此可见,《国学丛刊》如同《通报》

①王国维著,胡平生、马月华校注:《简牍检署考校注》,第65页。

②罗振玉:《国学丛刊序》,《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九集《〈面城精舍杂文〉甲乙编(又〈永丰乡人〉四稿)》,第184页。1914年复刊,1915年终刊,共出23卷。

③Edouard Chavannes, “Compte rendu de: Kouo hio ts'ong kan, Recueil de travaux se rapportant à l'érudition nationale, 1911,” *T'oung Pao*, vol. XII (1911), pp. 743-746.

④Edouard Chavannes et Paul Pelliot (traduit et annoté), “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 *Journal Asiatique*, X^e sér. (1911), pp. 499-617; XI^e sér. (1913), pp. 99-199, 261-394.

⑤罗振玉:《波斯教残经》,《国学丛刊》第二期,北京,1911年。“波斯教残经”后被命名为“摩尼教残经一”,如今保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现编号为BD00256。

一样,在引领学界研究动向上具有重要地位,不仅是中国学者的国学研究成果发表平台,也是西方汉学家关注中国同行最新研究的门户。沙畹认可《国学丛刊》在汉学界的重要地位,并给予积极的评价。

法文信中还补充到,罗振玉托伯希和转交沙畹的书籍除《国学丛刊》第三期外,还包括《傅青主集》及《敦煌石室遗书》。《傅青主集》应该是指1911年丁宝铨、缪荃孙及罗振玉等审定刊刻的《霜红龕集》,共44卷12册,在傅山所撰文集40卷的基础上,增加了《附录》3卷及罗氏校订的《傅青主先生年谱》1卷。《敦煌石室遗书》是1909年罗振玉等人依据伯希和随身携带的敦煌藏经洞里发现的唐代手写残卷而作的辑录。

此外,中文信中提到的沙畹论著《亚细亚旅行记》,即沙畹1907年在中国华北地区考古调查一年后的调查成果《华北考古记》(*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该书1909年出版两卷本图册,1913和1915年出版相关研究论著。中文信中罗振玉咨询“已刊行否”,而法文信则提供了更清晰的信息“您几年前赠送给我的两卷本图册的研究论著是否已出版”,这表明几年前沙畹曾寄送给罗振玉《华北考古记》的两卷本图册,而此次罗振玉想了解沙畹是否又出版了相关研究论著。罗氏在《汉两京石图像考序》中对两卷本图册亦有记录和评价:“博士以所著《河朔访古图志》(引者按:即《华北考古记》)见赠。启函读之,虽未见颜色,已于书中历历见游迹矣。”^①

三

沙畹先生阁下:

前寄函尚未得复报,企盼无似。敬维杖履休胜,定如远祝。前函敬询大著《木简考证》,不知何时告成,木简影本不知得先睹否。兹再以为请,尚祈见复为荷。兹因东友滨田学士赴欧留学之便,携奉《殷墟书契前编》一部,象片一页,祈赐存教正为幸。至《殷墟书契后编》,今年当(稿^②)定稿付印,届期定以就正于左右。前编但印百部,若贵邦学者有愿购者,每部印刷价三十元,幸得先生介绍而流传之,则古文字为不虚出矣。近著有印成者,尚求随时见寄。并求赐尊照,以当晤面,并使小儿辈得瞻山斗,幸甚幸甚。肃此敬申,即颂著祉。春寒,伏希为道珍重,不赐。

弟罗振玉再拜。正月二十二日。小儿福苕侍叩。

^①罗振玉:《汉两京石刻图像考序》,《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集《松翁近稿(外十种)》,第779-780页。

^②此处原信衍一“稿”字,原文以右侧墨点标注。

再,前年敝国金君由欧返国,奉到贵国拿破仑亲王见赐大著,拜领谢谢。其时以乱事旁午,至今未及奉谢,甚以为歉。并附呈《铁云藏龟》《敦煌石室遗书》《贞卜文字考》各一部,敬求转呈为荷。弟玉又启。

此信附法文翻译,法文标注日期为“1913年2月27日”,与中文“正月二十二日”日期相符。

上一封信罗振玉没有收到沙畹的回信,一个多月后他借日本考古学家、汉学家滨田耕作(1881-1938)留学欧洲之际再次致信沙畹。信文开头罗振玉第三次咨询沙畹论著《木简考证》^①的进度,并询问是否可以在沙畹成书之前先获得相关简牍照片,这也是他写信最重要目的之一。

罗氏随信赠送沙畹自己的最新论著《殷墟书契前编》(共二十卷)以及本人相片一张,同时请沙畹转赠“拿破仑亲王”《铁云藏龟》《敦煌石室遗书》《殷商贞卜文字考》各一部。据滨田耕作在悼念沙畹的文章《沙畹博士二三事》中回忆,在其留学前夕,罗振玉托其带给沙畹“一个大大的包裹”,当他到达伦敦后,先将罗振玉的包裹邮寄给沙畹,这大概在1913年夏天前后,也是他第一次与沙畹通信^②。“大大的包裹”应该就是指这些书籍。《殷墟书契前编》二十卷成书于“阴历癸丑正月”,约为1913年2月,与写信日期相吻合。罗振玉赠送沙畹《殷墟书契前编》的同时,也希望推广自己的这部论著,价格是30日本银元,即75法郎(法文信补充)。

此外,信中所提到的“由欧返国”的“金君”为金绍城(1878-1926),他是罗振玉的友人及同乡,近代法学家及画家。金绍城于1910年8月至1911年5月间进行了环球旅行。法文信中明确显示,“金先生(M. King)1911年从法国回到北京”,对应中文信中“前年”。这与金绍城环球旅行后的回国时间1911年5月相吻合。金绍城在法期间两次面见沙畹,分别为1910年12月10日及13日,并且在1911年9月回国后告知罗振玉,沙畹正在研究斯坦因获取的汉晋木简^③。转给罗振玉的书应该就是金绍城面见沙畹时获得的。金氏在沙畹与罗振玉早期的沟通交往中起到促进作用。金氏带回国的“拿破仑亲王”(第五封信写作“拿破仑公爵”)大著,中文信中虽未明确,但法文信则补充到,是“有关元朝货币研究的论著”(les recherches des monnaies des

①此处及下文所引罗振玉信中的《木简考证》、《古木简考》、《木简考》、《汉木简考》均指同一本书,即 *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 Imprimerie de l'Université, 1913), 现中文译名为《斯坦因新疆沙漠所获汉文文书》,不再一一标注。

②转引自王冀青:《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第117页。

③王冀青:《金绍城与中国简牍学的起源》,《敦煌学辑刊》2018年第2期,第135-151页。

Yuên)。考证相关史料可知,罗振玉所指的“拿破仑亲王”实则是波拿巴亲王(Prince Roland Bonaparte, 1858-1924),为拿破仑家族的后代,地理及植物学家。而此论著为1895年波拿巴亲王署名并资助出版的《十三至十四世纪蒙古时期的文献》。此书是几位欧洲东方学家共同对沙畹从中国带回的居庸关云台券洞墙上的多种石刻经文拓片(汉、藏、维吾尔、八思巴文以及当时法国学者还未释读出来的西夏文)^①,以及法国公私所藏蒙元时期的钱币和文字拓片进行的翻译与研究,并配有大幅拓片影印件,是当时法国学界对东方语言研究和考释的集大成之作。因此,罗振玉所指应为此书,而关于元朝货币的研究只是这本书中的一部分。沙畹替波拿巴亲王将此书赠送罗振玉,可见其对罗振玉的重视。罗振玉委托沙畹将当时中国学界重要的三部古文字论著回赠波拿巴亲王。

四

沙畹博士先生阁下:

昨得赐书,拜悉一切。并承寄尊照,邮局尚未送到,然已想望丰采,形诸梦寐矣。大著《古木简考》年内决成否?翘望此书已三年矣,不何日方到眼也。伯希和君见赐尊译《史记》拜领,命小儿诵读,沾溉后学,良匪浅鲜,至快至谢。昨闻伯希和君有赴北京消息,不知信否,恐其已就行程,复书一函,求转交,以免遗失。敦煌各书,弟尚欲求代为影照,祈先生幸赞成之,至幸至幸。专此奉复,敬颂道履。

弟罗振玉再拜,二月廿九日

托东友滨田君携奉之书件到未?祈便示复。又启。

此信附有法文翻译,中法文日期均标注为1913年4月5日所写^②。

由信的内容可知,1913年4月4日罗振玉收到沙畹的回信。此信中罗振玉继续咨询沙畹的木简考释本年度是否可以完成,他等待这一研究成果

①沙畹负责其中的汉文文本,法国印度学家烈维(Sylvain Lévi, 1863-1935)负责藏文,俄罗斯科学院突厥学家拉德洛夫(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Ра́длов, 1837-1918)负责维吾尔文、德国蒙古学学者胡特(Georg Huth, 1867-1906)负责八思巴文。参见 Prince Roland Bonaparte, *Documents de l'époque mongole des XIII^e et XIV^e siècles*, Paris, Gravé et imprimé pour l'auteur, 1895, p. I "avant-propos".

②在吉美博物馆“伯希和档案”中,保存有一封罗振玉同一天写给伯希和的信,其中罗振玉提及收到了伯氏寄送的沙畹《司马迁〈史记〉》译著(Lettre de Luo Zhenyu à Pelliot, le 5 avril 1913, Fonds Pelliot, Pel C64d, Correspondance Pelliot, 1913, Musée Guimet),与此处罗振玉致沙畹的信件相呼应。

已有三年,这也与罗振玉 1911 年从金绍城处得知沙畹正在研究简牍一事的时间相吻合。

在第二封信中,罗振玉曾向沙畹咨询购买《史记》法译本的事宜,此次从伯希和处收到寄来的沙畹《司马迁〈史记〉》译著,让儿子福苕阅读学习。此外,听说伯希和要去北京,罗振玉请求沙畹帮忙转交信函,希望伯希和继续拍摄敦煌文书。据上引罗振玉同一天写给伯希和的信可知,他在中文报纸上看到了伯希和要赴北京的消息,但后者当时并未成行,而是在一战开始后于 1916 年作为陆军武官次官调任北京的法国驻华使馆^①。

五

沙畹先生阁下:

久不得手教,远念殊切,忽奉到惠书,喜可知也。并闻大著《木简考》现已付印,二三月内即可竣工,尤为欢忭,引领以望。届时千祈迅示,以慰渴企。前有弟所撰《石室遗书》跋尾八篇,托伯希和兄转奉,不知收到否。兹尚有《春秋后语》跋三篇,王君《太公家教》《后语背记》跋各一篇,敬祈大教。又一分,乞转交伯希和君,费神至谢。溽暑挥汗,不知贵国气候何似。至念至念。拿破仑公爵复书拜收,请代致谢意。此请著安,不备。

弟罗振玉再拜。小儿福苕侍叩。阴历六月二十九夕

伯希和君同致候,乞代致鄙意。

此信言罗振玉收到沙畹回信并得知沙畹的《斯坦因新疆沙漠所获汉文文书》一书已付梓。是书于 1913 年出版,可知此信写于 1913 年 8 月 1 日。自此信开始,不再配有法文翻译,很可能是因为罗振玉看了沙畹的中文回信^②,并通过儿子罗福苕了解到沙畹的《史记》翻译内容及水平,知道其中文功底深厚,可以直接进行中文交流,便不再附法文翻译。

信中罗振玉所撰《石室遗书》是指《敦煌石室遗书》,罗振玉又补充了尾跋八篇,在此信之前已托伯希和转交沙畹。尾跋八篇尚不明确具体篇目,但这些跋文应该均被收入罗振玉编撰的《鸣沙石室佚书》,是以伯希和三年来邮寄的法藏敦煌写卷照片及小部分自藏的敦煌写卷照片编撰的,子目总计十九种,完成于 1913 年 10 月。罗振玉是以“随写随刊、随刊随送(或售)”的

^①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历史研究》1997 年第 5 期,第 122 页。

^②吉美博物馆也保存着若干沙畹中文回信的草稿。

方式编写该书的^①。罗振玉随此信复赠沙畹与伯希和自己和王国维的最新敦煌文书研究,包括罗氏所撰《春秋后语》三篇跋文^②及王氏所撰《唐写本〈太公家教〉跋》和《唐写本〈春秋后语〉背记跋》。此外,罗振玉寄送波拿巴亲王的书信得到了回复。

六

沙畹先生有道:

前得手书。敬悉道履安善,至慰至慰。近日尊著《木简考》已出版否,翘盼无似。兹因敝国友人之便,携奉拙刻《宸翰楼丛书》一部,内有《昭陵碑补录》,承先生见借拓本,已于跋中敬记高谊,以志不忘。专此敬申,即请著安。

弟罗振玉再拜。九月五日

此札所附信封含邮戳,显示1913年10月5日寄自日本京都,与信尾阴历“九月五日”(即1913年10月4日)相吻合。

此信可与罗振玉“癸丑年九月四日”寄给伯希和的信相互参照^③。《宸翰楼丛书》1911年首版,罗振玉在致伯希和的信中赠送该书一部,在致沙畹信中也赠送该书。其中《昭陵碑补录》的完成受惠于沙畹所借拓本,罗振玉在序中记述了这件事:“岁戊申(引者按:1908年),既写定昭陵诸碑为《昭陵碑录》。明年秋,晤法人伯希和学士,为言近十馀年间昭陵新出土数碑,且言其行篋有墨本,惜束装待发,不及见示也。予闻而亟询诸同好及碑贾,无知者。又函关中友人求之,亦不可得……今年秋(引者按:1910年),伯希和氏乃将沙畹博士藏本邮示,计《程知节》等凡四碑。”^④而沙畹所提供的四块昭陵碑文拓本分别为:《程知节碑》《越国太妃燕氏碑》《房仁裕碑》《周道务碑》。同时罗氏又从内藤湖南(1866-1934)手中获得一块沙畹也未收藏的《宇文士及碑》的影本,最终得以补全自己的辑录。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罗振玉写给伯希和的信,以咨询敦煌影本及交流敦煌文书研究为主,在给沙畹的信中主要关心木简研究的进度和出版情况,“翘盼无似”之情见于笔端。

①罗继祖辑述:《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二集《雪堂剩墨》,第389页。蔡渊迪:《法国吉美博物馆藏罗振玉、董康致伯希和书信四通考证》,第75-76页。

②成文于阴历癸丑年(1913)六月中旬。包括《敦煌春秋后国语略出残卷跋》《敦煌春秋后语秦语残卷跋》《敦煌春秋后语魏语残卷跋》。

③蔡渊迪:《法国吉美博物馆藏罗振玉、董康致伯希和书信四通考证》,第74页。

④罗振玉:《昭陵碑录补序》,《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九集《〈面城精舍杂文〉甲乙编(又〈永丰乡人〉四稿)》,第217-218页。

七

沙畹先生有道：

奉到赐书，如饥渴之得饮食，喜可知也。又知大著《朔方访古图志》《汉木简考》已付邮，尤为感慰。但闻木简汉以后尚不少，不知信否也，亦为考释否，念切念切。弟近编写《邙洛冢墓遗文》三卷，专录洛阳出土诸墓志，由魏迄宋，约百余种。明春计可印成，当以奉教。又近印《齐鲁封泥集存》，专补《封泥考略》之缺，五六日间必当可装成，当付邮寄，先乞大雅，专此肃谢。即颂著安。

弟振玉再拜。十一月初六日

八

沙畹先生阁下：

前日邮局送到大著《木简考》，狂喜如获异宝。因命小儿译序例，拜读一过，至佩至佩。今日读诸简牍一过，深喜今日得见二千年前墨书手迹，并得考见当日西域情状。微先生考释与司坦因博士发掘之功不可得也。意欲就管见所及，继先生之后为之考证，以饷我东方学者，当亦先生之所嘉许也。考证有得，当随时奉呈，以求大教。弟前读司坦因博士演说《西域访古事》，极慕其人，顾苦不相识，若先生为作介绍书赐下，弟再加函通问，幸甚幸甚，千祈勿却。大著《汉石刻考》亦拜领，当敬谨译读，感谢无似。敬赠弟之旧著旧刻十一种，敬求赐存。拙著乃二十年前所作，甚惭固陋。旧刻中《黑鞅事略》刻本久绝，此从写本付印，流传甚少。《齐鲁封泥集存》乃新印成者。又再敬求转赠国民图书馆为荷。近何所撰述，若须敝国何种书籍，若易觅者定为觅寄，其罕见之本，若敝斋所有，先生尽可借观。令世界学者得通学术之邮，此区区之志，当亦先生之志也。专此敬谢，即颂著祉。

弟罗振玉再拜。

九

沙畹先生有道：

奉到赐书，又承惠大著《古画过眼录》，重迭拜赐，何以克当，谨谢谨谢。大著《汉石刻图象考》大略读竟，僭制一序奉赠，敬求指正。司坦因博士承作书介绍，感荷不可言喻，业已付邮。他日得多见西陲古物，皆先生所赐也。大著《木简考》循览再三，敬服用力之勤，苦心考证，功业至隆。乃来书属订正讹误，虚怀雅量，钦佩尤深。弟以东方人士能读法

文者少,故以邦文解释,其有考证乃继尊著而有作,所谓继事者易为功,而开辟丛棘,俾通径路,则皆先生之功也。现略分全书为三种,一、小学、术数、方技书,二、屯戍丛残,三、简牍遗文,总名《流沙坠简》。削稿粗定,一二月后当可印成,当敬呈大教,以志尊惠。先生近何所造(著^①)述,便求示复一二,以慰在远,幸甚幸甚。肃此敬复,即请著安。不尽缕缕。

弟罗振玉再拜。上元后二日

十

沙畹先生阁下:

前承寄赠大著二种,先后收到,感谢无似。当令小儿译述,俾窥粹美。比维著述日富,定慰远怀。兹敬呈弟与敝友王君静安所考《流沙坠简》一部,敬求大教。此次(书^②)成书草草,缮写时亦有讹误,未能尽加改正,异日当欲修改(完^③)所有疏误,千祈不吝教益,至为翹企。斯坦因博士近通问否,不知此行又得何古物。便祈示知。专此敬申,即颂著祉。

弟罗振玉再拜。三月二十九日

再,东友狩野博士言书牋中(“简牍遗文”第三页后幅第一二两纸)有绢本,弟因据以为说。然细审之,乃纸本也,今始知其误,如此类者,恐尚不少,祈赐正至感。又申。

十一

沙畹先生阁下:

前两寄函件,不知已达左右否。未得复书,甚以为念。比维履道坦坦,远祝良殷。拙著《西陲石刻录》《芒洛冢墓遗文》昨日甫印成。寄奉清鉴,尚祈海正为荷。专此敬申,便希示近状,曷胜翹企。此颂著安。

弟振玉再拜。五月初八日

从第七封信至第十一封信主要涉及罗振玉从收到沙畹的论著《斯坦因新疆沙漠所获汉文文书》到与王国维合作完成《流沙坠简》并回寄沙畹的一段历史。

首先从时间上看,第七封信中罗振玉提到“近印《齐鲁封泥集存》”,该书

①此处原信衍一“著”字,原文以右侧墨点标注。

②此处原信误为“书”字,原文以右侧墨点标注,另书“次”字。

③此处原信衍一“完”字,原文以右侧墨点标注。

1913年阴历九月辑成^①，则可确定信亦写于1913年（公历12月3日）。第七封信中“《汉木简考》已付邮”可与第八封信“前日邮局送到大著《木简考》”相对应，第八封信虽未标注写作日期，但据内容可知，是罗振玉收到沙畹简牍研究论著后的首封回信，而根据第九封信“大著《木简考》循览再三，敬服用力之勤”，及《流沙坠简》“削稿粗定”，可知第八封信应该写于第七封信与第九封信之间。第九封信写于“上元后二日”，为罗氏研读沙畹《木简考》一段时间后的再次致信，此时他已与王国维完成《流沙坠简》初稿，可知此信应写1914年2月11日。因此，第八封信推测应该写于1913年底或1914年初。写第十封信时罗、王二人已完成《流沙坠简》，寄送沙畹一份，可知写于1914年4月24日。第十一封信是罗振玉在两次致信沙畹未得回复的情况下写的。在内容上与第九、第十封信有承接，且信中提到罗振玉新著《西陲石刻录》《芒洛冢墓遗文》两书“昨日甫印成”，此二书编于甲寅年二月，与第十一封信所述印成时间相吻合，因此可确定此信写于阳历1914年6月1日。

从内容来看，这几封信涉及罗振玉收到沙畹赠书以及向沙畹赠书两部分内容。

首先，罗振玉收到的沙畹赠书包括《斯坦因新疆沙漠所获汉文文书》。沙畹于1913年底寄出该书，很快，到1914年2月，罗振玉便与王国维制定好了《流沙坠简》的大纲并撰出草稿。第九封信中罗振玉向沙畹介绍了《流沙坠简》对简牍的三种分类方法，同样的内容可在罗氏同期写给王国维的信中找到对应^②。1914年4月罗振玉将《流沙坠简》成稿随第十封信寄给沙畹，可见罗、王考释速度之快、效率之高。《流沙坠简》中，罗、王二人在沙畹991枚简牍的基础上共筛选出580枚左右简牍^③，同时补充了4枚日本探险家橘瑞超保存的简牍进行考释。在二人所撰《流沙坠简》的序言中，他们分别讲述了获得木简的经过，并赞赏沙畹的论著，向其表示谢意。一方面，罗振玉认为沙畹“用力之勤，苦心考证，功业至隆”，而他与王国维的工作是延续沙

①罗继祖辑述：《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二集《雪堂剩墨》，第390页。

②罗振玉、王国维著，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9页。

③关于《流沙坠简》及《流沙坠简补遗考释》合计考释的简牍数量，罗琨统计为577枚（《罗振玉、王国维与〈流沙坠简〉》，李学勤、谢桂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辑：《简帛研究》第3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10页）。何立民统计为589枚，其中《流沙坠简》考释585枚，《补遗》考释4枚（《简帛研究的开山之作——读〈流沙坠简〉并论王国维先生简帛文书研究的贡献》，《南方文物》2010年第3期，第30页）。

畹之著述而作。在《流沙坠简》的研究文本中,沙畹的名字共出现 28 次,其中大部分情况是确认沙畹的研究结果,这也从侧面说明他们以沙畹的研究为参考并肯定其价值。但另一方面,在文献学家赵万里(1905-1980)所撰《王静安先生年谱》中,也记录了罗、王二人重新考释简牍的另一个原因:“其中颇有不惬意处,罗先生与先生乃发愤重行分类考订。”^①由此可见,即便被斯坦因认为是“当时欧洲学界唯一有能力考释汉简”^②的沙畹,在中国学生吴勤训和魏怀的帮助下,其对汉代手写文书的辨识和解读能力仍有不足。对此沙畹似乎已有所察觉,他说:“即使是以(论著中的)许多错误为代价,也最好将斯坦因先生发现的所有文书向学界公开。”^③相比较而言,罗振玉与王国维在短时间内撰写的《流沙坠简》,虽然是在沙畹的基础上进行的修订和深入,但也被罗振玉认为是“成书草草,缮写时亦有讹误,未能尽加改正”,并在第十封信中针对“简牍遗文”中的一处错误进行了更正。在这之后,沙畹未再开展过有关汉简的研究,而王国维则于 1914、1916 年先后出版两本修订论著《流沙坠简补遗考释》及《流沙坠简考释补正》。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沙畹与罗、王二人的论著在中外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讨论和研究,中外简牍学的研究也由此发轫。

罗振玉收到的另一本沙畹论著为其最新出版的《华北考古记》研究论著第一卷《汉代石刻》(*La Sculpture à l'époque des Han*, 第七封信中写为《朔方访古图志》,第八封信中写为《汉石刻考》,第九封信中写为《汉石刻图象考》)。罗振玉曾在第二封信中向沙畹咨询过该书的研究进度。1914 年,他为该书作《汉两京石图像考序》并赠送沙畹,即第九封信中所言“僭制一序奉赠”。序言中提到“去年冬,寄其所著《汉两京石刻图像考》至”^④与第七封信中说

①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二十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 428 页。

②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Obituary Notice: Edouard Chavanne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1, no. 2 (1918), p. 147.

③Edouard Chavannes, *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p. b3 “Avant-propos”.

④结合吉美博物馆所藏沙畹妻子致伯希和书信中提到的沙畹生前赠送《华北考古记》的人员名单(Lettre d'Alice Dor à Paul Pelliot, le 25 mars 1920, Fonds Pelliot, Pel C71a, Correspondance Pelliot, 1920, Musée Guimet)可知,沙畹寄给罗振玉的《华北考古记》为两卷本图册及第一卷研究论著,1915 年出版的第二卷研究论著并没有寄送给罗振玉。亦可参见 He Mengying, “Edouard Chavannes, Lu Xun et la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tome 103, 2017, p. 454.

“《朔方访古图志》已付邮”的时间相对应。在通过罗福苕的翻译阅读《汉代石刻》后,罗振玉感慨到:“此予之夙志也,君乃先我着鞭。且所考释至精博,如释‘足踏弩’为‘蹶张’,释‘捕兔之网’为‘毕’,均坚确不可易……古画像石刻之有裨考古如是,则博士特为之考释,所见诚赅矣哉。”^①可见罗振玉非常认可沙畹对考古材料的收集与考释工作,且在此思路下,他对汉画像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也做了进一步分析与研究。他同意沙畹的观点,认为某些图像可以为古文字的考释或者史书记载的文字提供佐证。但同时也强调,由于时代的变迁以及画工讹误,汉代画像不能作为研究先秦时期图像的证据使用。

第九封信中罗振玉提及沙畹赠书《古画过眼录》。在吉美博物馆“沙畹档案”所藏的同一批书札中,保存有此信的沙畹手书中文回信草稿,沙畹称此书是自己与斯坦因合著的书籍。而沙畹唯一一本与斯坦因合作的著述是1907年出版的两卷本《古和阗考》^②,沙畹在其中贡献了《丹丹乌里克、尼雅和安迪尔发现的汉文文书》(*Chinese Documents from the sites of Dandān-Uiliq, Niya and Endere*)一文,整理、转写、翻译并考释了斯坦因第一次中亚探险所获的文书。《古和阗考》第一卷为研究论著,第二卷图册部分包括119页图版,为斯坦因考察期间的地图、实景照片以及发掘出的物品照片,与《古画过眼录》的书名相符。

罗振玉赠送沙畹的著述包括:《黑鞑事略》《齐鲁封泥集存》《流沙坠简》《西陲石刻录》及《邛洛冢墓遗文》。第八封信中提及的“旧著旧刻十一种”中有《黑鞑事略》印本一本。此书由南宋彭大雅撰、徐霆作疏,是有关蒙古的见闻录。至清末已流传甚少,因此罗振玉出资重刻印。《齐鲁封泥集存》是罗振玉专门针对吴式芬和陈介祺合撰的《封泥考略》(1904刊行,收录849方战国秦汉封泥)进行的补订,共收集汉代官私印封泥谱录449方,1913年成书。罗氏请沙畹将此书转赠“国民图书馆”,即法国国家图书馆。第十一封信中,罗振玉随信赠送沙畹新印成的《西陲石刻录》和《芒洛冢墓遗文》(3卷),内容为罗振玉历年收藏的古代墓志碑文拓片千余种。

从上述信中还可以注意到以下几点:首先,第八封信中,罗振玉提及阅读了斯坦因的“演说《西域访古事》”,应指斯坦因1909年3月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并于同年发表在《英国地理学杂志》(*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①罗振玉:《汉两京石刻图像考序》,《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集《松翁近稿(外十种)》下,第780-781页。

②Aurel Stein,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2 vol., The Clarendon Press, 1907.

的演讲稿《1906年至1908年间在中亚细亚的探险》(“Archaeological Notes during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1906-8”)。1909年,王国维将其翻译为中文,名为《中亚细亚探险谈》,是中国最早介绍外国人中亚考察的译文之一^①。此外,罗氏希望沙畹能介绍自己与斯坦因认识。而事实上,早在1912年9月沙畹就已在信中向斯坦因推荐过罗振玉。当时斯坦因希望沙畹考释新疆出土的汉文封泥,而沙畹认为自己工作繁多且独自考释有困难,因此建议斯坦因邀请罗振玉来协助工作。据王冀青研究,这是沙畹首次向斯坦因提及罗振玉^②。不过,从罗振玉致沙畹的第八封信来看,罗氏并没有参与到考释斯坦因封泥的工作中,也不知道沙畹曾向斯坦因推荐过自己,但他在沙畹的引荐下,最终得以与斯坦因“通书问”^③。此外,罗振玉向沙畹表示愿意帮忙寻找并购买其需要的中文书籍,或者可以借阅自己的藏书,以“令世界学者得通学术之卮”。可见罗振玉拥有学术无国界、愿意对外交流的开放心态。

第十一封信附信封,非邮局寄出,封面以法文写道“交由卢先生悉心转达”(Confié aux bons soins de Monsieur Loo)。此处的“卢先生”(Monsieur Loo)是指古董商人卢芹斋(1880-1957),他曾作为中间商将中国国内的古物大量出售给西方,通常被认为是“文物大盗”。近年一些研究也逐渐揭开他在中西学者交流中的积极作用^④,此处卢芹斋帮助罗振玉转交沙畹信件和论著的事实亦可作为佐证。

十二

沙畹先生阁下:

久不得音问,方以为念。顷奉手书,欣喜无似。维起居安善为祝。《流沙坠简》至今尚未寄到,甚异。此刻不知已达尊右否。兹呈《补遗》一册,仍求赐正。此书印行太促,中有讹误,幸不吝教诲为荷。贵友马君来时,当请教一切。承寄《古画过眼录》,拜赐敬谢。前寄到时,适弟返上海,故未及当复,甚歉甚歉。司坦因君已抵蒲昌海,以后得何古物,

①最初收入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附录《流沙访古记》。参见王国维:《中亚细亚探险谈》,《王国维全集》第十九卷,第631-657页;王冀青:《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第73-74页。

②王冀青:《金绍城与中国简牍学的起源》,《敦煌学辑刊》2018年第2期,第150页。

③罗振玉:《集蓼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一集《集蓼编(外八种)》,第63页。

④有关卢芹斋的详尽研究,参见 G rardine Lenain, *Monsieur Loo: Le roman d'un marchand d'art asiatique*, Picquier, 2013。

尚求见示。至感至盼。专此敬覆,并颂著祉。

弟罗振玉再拜。

此信未标注时间,但依据内容可知《流沙坠简》“尚未寄到”,而罗振玉与王国维的《流沙坠简补遗》已完成并将随此信寄送沙畹。王国维在《补遗》中所标注的考释时间是“甲寅三月清明节之后二日”^①(1914年4月7日),即《流沙坠简》完成后不久,对应第十封信中所言“此次成书草草,缮写时亦有讹误,未能尽加改正,异日当欲修改所有疏误”,故在第十封信之后。由于第十一封信开头“前两寄函件……未得复书”,而此信中写“久不得音问……顷奉手书”,可推测此信写于第十一封信之后,即1914年6月1日之后。

此外,第十封信罗振玉曾咨询沙畹“斯坦因博士近通问否,不知此行又得何古物”与本信中所写“司坦因君已抵蒲昌海,以后得何古物,尚求见示”相照应,可知罗振玉了解到了斯坦因的最新考古进展。“蒲昌海”即罗布泊,是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1913年8月至1915年7月)的目的地之一。他于1913年8月进入新疆,之后到达罗布泊,考察了米阮遗址和楼兰遗址,1914年3月再次到达敦煌,搜集到残存的莫高窟藏经洞文书。而在5月至6月间,斯坦因探访并挖掘了西夏故地黑水城,获得西夏文物^②。信中提到的“贵友马君”为沙畹弟子马伯乐,中国古代历史、道教及音韵学研究专家。马伯乐于1914年5月来华,在浙江省杭州、绍兴、宁波等地区进行考古学调查直到同年8月。他原计划考察完中国之后继续前往朝鲜和日本,但由于战争的缘故被紧急召回法国。写信时罗振玉身处日本京都,原计划在日本与马伯乐相见并“请教一切”,但最终未得见。

十三

沙畹先生阁下:

久不得手书,远念甚切。比来全欧争战方殷,不知杖履不惊否。前疑阁下或因兵事移居,后在大阪书店见购书信片,则居址仍旧,至慰至慰。现在兵事有弭平之望否?深盼早日和平也。伯希和君从事兵役否?有信求转交为荷^③。贵国学者均无恙否?系念甚切,尚祈赐示一二,以慰远怀,至盼至盼。前寄《流沙坠简》是否寄到?尚求赐正。近刻又有数种,俟兵事略定再寄奉,此颂著安。

弟罗振玉顿首。王君静安托为问讯。九月十七日

^①王国维:《流沙坠简补遗考释》,《王国维全集》第四卷,第173页。

^②王冀青:《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第148-156页。

^③“有信求转交为荷”七字为小字,书于“伯希和”句之右。

十四

沙畹先生阁下：

前因战事起，远念先生及伯君殊甚，故发书奉询起居。后阅日本友人函，知先生安隐，伯君虽从军，固健在，为额手称庆。顷得来书，与东友函正合，欣快无似。弟前与敝友王君考释《流沙坠简》，成书匆促，讹漏尚多。书成以后，又有补正，尚未能尽其蕴。乃来书褒饰，愧不敢当。弟近撰《殷墟书契考释》已告成，一二星期后即装订完好，届时当寄呈大教。伯君所索《流沙坠简》当一同寄奉不误。承询敝国金石家年龄，兹另纸开呈，祈赐存为荷。弟于明年拟撰《金石学绪录》，专论此学之流派，及以前治此学者之得失，及以后研究之方法，俟书成，再奉大教。专此敬覆，即颂著安。

弟罗振玉顿首。十二月二十六日

王君静安并敬问起居。伯希和君身在行间，尚不废读书，至念至佩，乞代致候。

吴中丞，大澂，卒年六十八，光绪二十八年卒。

端忠敏公，方，卒年五十二，宣统三年卒。

杨守敬氏，年七十有七，今年已卒。

缪荃孙氏，今年七十有三，尚存。

罗振璫，年二十四（光绪十二年卒）。著有《碑别字》，伯希和君有此书。

蒋黼，年四十六（宣统三年卒）。

第十三封信附信封，邮戳显示公历 1914 年 11 月 6 日寄自日本京都，与信末落款“九月十七日”即公历 1914 年 11 月 4 日吻合。第十四封信落款十二月二十六日，信中提到“弟近撰《殷墟书契考释》，已告成”，王国维为此书作序的时间是“甲寅冬十有二月旬有一日”（公历 1915 年 1 月 26 日）；信中又提到“杨守敬今年已卒”，杨守敬去世于公历 1915 年 1 月 9 日。综上可确定，第十四封信写于 1915 年 2 月 9 日。

这两封信主要涉及以下几件事：一是“比来全欧争战方殷”，即 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受战争影响，1914 至 1917 年间罗振玉与沙畹的信件邮寄受到阻碍，罗振玉致伯希和的书信也长时间中断^①。

^①祖艳馥、达西娅·维埃荷-罗斯编著：《史与物：中国学者与法国汉学家论学书札辑注》，第 86-123 页。此书中对罗振玉致伯希和的若干信札日期考证有误，修正后的日期参见蔡渊迪：《法国吉美博物馆藏罗振玉、董康至伯希和书信四通考证》，第 73-79 页。

第二件事有关《流沙坠简》。第十三封信中,罗振玉寄出的《流沙坠简》依然下落不明,而在第十四封信中所言“乃来书褒饰”说明沙畹收到了《流沙坠简》及《补遗》,并十分肯定罗、王的考释工作^①。此外,伯希和也向罗振玉索要该书,再次说明法国汉学家对此书的重视。

第三件事涉及罗振玉赠送沙畹的书籍。第十三封信中,罗振玉提到“近刻又有数种”,此处虽未明示,但在前几封信已赠送《西陲刻石录》《芒洛冢墓遗文》及《流沙坠简补遗》之后,依据罗振玉年谱可知,1914年罗振玉著书还包括《殷墟书契菁华》《秦金石刻辞》《唐风楼秦汉瓦当文字》《四朝钞币图录》《蒿里遗珍》等十二种^②,此信中提到的当为其中书籍。而第十四封信中,罗振玉提到“近撰《殷墟书契考释》”“一二星期后,即装订完好”。该书完成于1915年,是在《殷墟书契》的基础上,对“大云书库”所藏数万片甲骨进行遴选和甄别后完成的又一甲骨文研究,王国维对之进行了修订,该书也标志着中国学者对甲骨文的研究从初创进入全盛时期。此外,罗振玉还提到自己下一年的研究计划,“拟撰《金石学绪录》”。

第四件事是罗振玉和沙畹分别咨询对方国家学者的近况。第十三封信中,罗振玉咨询沙畹“贵国学者均无恙否”,而第十四封信中,罗振玉针对沙畹询问“敝国金石家年龄”给出回复。推测沙畹虽未与这几位学者有直接交往,但应该已阅读并了解他们的研究,罗振玉则是沙畹与这些学者沟通的一座桥梁,他之前也曾赠送给沙畹其中几位学者的书籍。此处罗振玉专门补充了自己的长兄罗振鋈的研究论著《碑别字》,很可能是担心沙畹对自己英年早逝的长兄不太熟悉。

也许是受到沙畹、斯坦因、伯希和、马伯乐这些西方学者的影响和刺激,1915年3月至4月间,罗振玉探访了山东、山西、天津、河北、河南等地,考察曲阜孔庙、孔林、龙门石窟,也曾亲赴安阳小屯村实地考察甲骨出土之事宜。他观察到各地地上地下的珍贵文物没有被很好地保护、甚至遭到破坏。因此大量收购石刻碑铭、画像拓片甚至找人拓印,同时购买瓦当、明器等古器物,以尽力抢救。他明白“出土地与考古极有关系,前人多忽之,良以古物多

①沙畹的私人藏书在其去世后保存在法国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图书馆“沙畹及马伯乐档案”中(Fonds Chavannes et Maspero),其中包含罗振玉当年送给沙畹的《流沙坠简》《流沙坠简补遗考释》及其他书籍。在《流沙坠简》(书号:E. C. 987)第二卷的封面,有罗振玉题写的赠言“敬赠沙畹博士教正罗振玉谨寄”及其印章。

②罗继祖辑述:《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二集《雪堂剩墨》,第391-396页。

得之估人,往往讳不言,或谎言以应”^①。同年阴历九月,罗振玉又编印《海外贞珉录》,收录中国流入海外的石刻品目 140 种,来自“日本公私所藏”、“欧人著书”及“我国估人之商于域外者”。据罗继祖言,罗振玉“常恨金石刻归异域,有写影无拓墨,经学者考证成书者,不过一二”,遂成此书^②。1920 年,罗振玉又在此基础上,集日本与欧美所藏中国钟、鼎、角、爵等古吉金 229 件,作《海外吉金录》^③。

第十四封信是沙畹档案所藏罗振玉的最后一封信,但据内容推测,罗振玉还计划将自己的下一部论著寄送沙畹,所以这应该不是二人实际交往中的最后一封信。此外,除上文所引十四封信外,罗振玉与沙畹应该还有其他通信。据罗振玉自述,“当以我西陲古卷轴入欧洲者所见仅百分之一二,欲至英、德、法各国阅览。沙畹博士闻之欣然,方联合英、德学者,欲延予至欧洲为审定东方古文物。予将约忠悃(引者按,即王国维)偕往,乃未几而巴尔干大战起,乃中止”^④可知,罗振玉致沙畹的书札中应该还有关于罗振玉赴欧帮助沙畹等欧洲学者审定中国古物的事宜。沙畹于 1918 年 1 月 29 日因积劳成疾逝世。而罗振玉此后依然与法国汉学界保持交往。据法藏资料可知,直到 1927 年罗振玉与伯希和仍有信件往来^⑤。

余论

以上十四通书札较为完整地展现出 1912 至 1915 年间罗振玉与沙畹的交往历史。在二人的交往中,罗振玉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多次致信沙畹并且赠送包括自己论著在内的多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他数次咨询沙畹木简的考释进度,并希望能尽早获得木简照片。虽然罗振玉与王国维在《流沙坠简》一书中热忱地感谢沙畹的慷慨及其对中国学者的支持,但是依然可以看出,在寄送简牍这件事上,沙畹并不十分积极。在罗振玉致信沙畹咨询木简研究进度的一年多时间里,沙畹始终没有将照片寄赠,似乎是不愿意在自

①罗继祖辑述:《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二集《雪堂剩墨》,第 399 页。

②罗继祖辑述:《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二集《雪堂剩墨》,第 402 页。

③罗振玉:《海外吉金录》,《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六集《汉两京以来镜铭集录(外十四种)》,第 659-682 页。

④罗振玉:《集蓼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一集《集蓼编(外八种)》,第 63 页。

⑤祖艳馥、达西娅·维埃荷-罗斯编著:《史与物:中国学者与法国汉学家论学书札辑注》,第 122-124 页。

己的研究完成之前提前将木简照片公布,不知这是斯坦因的意见还是沙畹自己的主张。可见对于新发现的文书等史料,沙畹或者说当时的海外汉学家们依然保留了“私心”,希望掌握史料的“首发权”。同样的情况也包括罗振玉向伯希和咨询敦煌写本照片时伯希和的反应^①。不过,最终在不懈努力下,1913年底,伴随沙畹的简牍研究付梓,罗振玉终于得到沙畹寄送的研究成果和所考释木简的照片。经历了三年的等待,罗振玉和王国维在获得资料的仅仅几个月后,便完成了《流沙坠简》作品的初版,研究可谓高效。在承认初版成果可能有很多疏漏的同时,他们采取了先出版、再发表《补遗》的方式修正和更新研究成果。以上均可见其向世人揭示这批古史材料、展现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急切心情。

罗振玉的儿子罗福苾在中法学者的交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不仅帮助父亲翻译书信^②,还进行中法学者研究论著的中法文互译。他曾将沙畹的《司马迁〈史记〉》《华北考古记》《斯坦因新疆沙漠所获汉文文书》等译为中文,1919年汉译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摩尼教考》,比冯承钧1931年发表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译文早十多年完成^③。1922年,王国维发表《摩尼教流行中国考》^④一文,其中加入了沙畹与伯希和的最新研究,侧面证明了罗福苾翻译工作的价值。罗福苾还翻译了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带回的敦煌文书的目录^⑤,以及伯希和整理的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文书目录^⑥。他也将其父的文章《殷商贞卜文字考》翻译成法文并寄送伯希和。据罗继祖言,“乡人年来校印西陲卷轴,传译欧文,皆出其(引者按:指罗福苾)手。”^⑦毫无疑问,罗福苾的翻译有助于中法学者及时了解对方的研究进展,并以此为基

①参见蔡渊迪:《法国吉美博物馆藏罗振玉、董康致伯希和书信四通考证》,第73-79页。

②吉美博物馆藏罗振玉写给伯希和的信共计十封,其中包括三封法文信及七封中文信,此外另有一封罗福苾写给伯希和的法文信。《史与物:中国学者与法国汉学家论学书札辑注》一书收录的不全,完整版参见 *Lettres de Luo Zhenyu à Pelliot, Fonds Pelliot, Pel C64d, Pel C64f, Pel C65f, Correspondance Pelliot, 1913, Musée Guimet*。

③王旭梁:《罗福苾生平及其学术述论》,第98页。罗福苾的上述翻译均未出版,仅供罗振玉和王国维等学者阅读与参考。

④王国维:《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亚洲学术杂志》第1卷(1922年)第2期,第1-12页。

⑤罗福苾:《伦敦博物馆敦煌书目》,《国学季刊》第1卷(1923年)第1号,第163-190页。
罗振玉:《亡儿福苾遗著三种序》,《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集《松翁近稿(外十种)》下,第806页。

⑥罗福苾译:《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伯希和氏敦煌将来书目》,《国学季刊》第1卷(1923年)第4号,第717-750页;《国学季刊》第3卷(1932年)第4号,第733-771页。

⑦罗继祖辑述:《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二集《雪堂剩墨》,第391页。

础开展进一步的学术研究。

在罗振玉与沙畹的交往中,两人都向对方赠送了金石学、简牍文字、敦煌文书以及甲骨文等方面的最新论著。而中外学者也对对方的论著给予高度关注,分别在自己的研究中参考和介绍。中国学者的古文字考释与研究能力,让包括沙畹在内的西方学者钦佩不已。伯希和曾说:“没有罗振玉与王国维,殷商甲骨文将无法被解读;而阅读沙畹对斯坦因考察所获汉文文书的研究时,也少不了参照罗、王二人的修正与补充。”^①法国汉学家的研究需要中国学者的反馈和补充,同样,中国学者也需要参阅法国汉学家的研究,因为后者以“他者”的视角审视中国,以科学批判的方法使用史料、研究历史,为汉学研究带来新的活力。中法学者间紧密且友好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国学与海外汉学的发展。一战爆发后,沙畹积极参与到后方的救援中,使得他原本羸弱的身体更不堪重负。沙畹去世后,更多的中国学者加入到与伯希和、马伯乐等法国汉学家的交流中,继续书写着中外学者的友谊与学术交流的篇章。

【作者简介】贺梦莹,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法国现代汉学史、中法学术交流史。周霄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青年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科技史。

^①Paul Pelliot, “Nécrologie-Wang Kouo-wei,” *T'oung Pao*, vol. XXVI (1928), p. 72.